

清代山西经济集聚论

晋商研究的一个视角

乔南 著

山西财经大学

【晋商研究当代文库】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清代山西經濟發展史

——以晉南、晉中、晉北為中心——

■ 王 健 著

山西經濟史叢書
【晉南晉中晉北文庫】

QING DAI SHAN XI JING JI JI LU

清代山西经济集聚论

晋商研究的一个视角

● 乔南 著

山西财经大学
【晋商研究当代文库】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晋商研究当代文库/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主编.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8. 2

ISBN 978 - 7 - 5096 - 0210 - 2

I. 晋… II. 山… III. 商业史—山西省—文集
IV. F729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7601 号

出版发行: 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8 号中雅大厦 11 层

电话: (010) 51915602 邮编: 100038

印刷: 北京银祥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

组稿编辑: 杜 菲

责任编辑: 杜 菲

技术编辑: 晓 成

责任校对: 超 凡

720mm × 1000mm/16

20 印张

317 千字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全 12 册 总定价 432.00 元

书号: ISBN 978 - 7 - 5096 - 0210 - 2/F · 206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印装错误, 由本社读者服务部
负责调换。联系地址: 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电话: (010) 68022974

邮编: 100836

山西财经大学

《晋商研究当代文库》

编委会

学术顾问：孔祥毅 张正明
编委会主任：杨怀恩 原梅生
编委：樊而峻 郭泽光 赵国浩 崔满红 王 森
黄鉴晖 葛贤慧 武三林 阎应福 孙长青
张亚兰 王永亮 乔 南 陶宏伟
主 编：崔满红
编辑部主任：王永亮
编 辑：陈 啸 薛秀艳 杨志勇 侯海燕

总序

山西是中国商业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山西商人是中国经济史上的劲旅，明清晋商更是因创造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历史奇迹而成为当时中国十大商帮之巨擘。历代晋商及其成就的辉煌事业虽然早已渐次消逝，但他们从崛起到兴盛、由兴盛而衰落的史实却蕴藏着丰富而绚烂多彩的知识瑰宝，在经济、管理、社会、艺术、法律等多学科领域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山西财经大学是国内建校时间最早的财经类高等院校之一，是从乔家大院走出来的商科大学。经济学、管理学始终是学校的优势学科，晋商研究始终是学校科研工作的特色之一。学校有组织的晋商研究工作已有近50年的历史。

1960年，原山西财经学院成立了山西票号史料整理小组，开始了晋商史料挖掘和研究工作。经过30年的研究，推出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以《“山西票号”的性质与作用》（杨荣晖，《光明日报》1961年5月22日第4版）、《山西票号研究集·第一集》（山西财经学院1982年编印）、《山西票号研究集·第二集》（山西财经学院1984年编印）和《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初版）为主要代表，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1991年开始，原山西财经学院的晋商研究工作突破了经院范式，呈现出历史考证与现实借鉴相结合、学术研究与社会服务并举的特色。1997年10月，原山西财经学院和原山西经济管理学院合并，更名为山西财经大学，学科特色和学术传统得以继续和加强。2002年，学校建成了金融货币史博物馆。2004年，山西省教育厅依托我校建立了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山西票号与晋商研究中心。这个阶段，我校的晋商研究视角不

清代山西经济集聚论

断拓展,研究成果更加丰硕——《山西商人及其历史启示》(孔祥毅、张正明,《山西日报》1991年11月18日、19日连载)、《山西票号史》(黄鉴晖,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年初版,2002年修订)、《明清山西商人研究》(葛贤慧,香港欧亚经济出版社,1992年)、《中国银行业史》(黄鉴晖,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商路漫漫五百年》(葛贤慧,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金融贸易史论》(孔祥毅,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晋商经营之道》(黄鉴晖,山西经济出版社,2001年)、《明清山西商人研究》(黄鉴晖,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晋商在会计发展史上的贡献》(孔祥毅,《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增订)、《山西票号研究》(孔祥毅、王森,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山西票号与中国商业革命》(孔祥毅,《金融研究》2002年第8期)、《金融票号史论》(孔祥毅,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版)、《镖局、标期、标利与中国北方社会信用》(孔祥毅,《金融研究》2004年第1期)、《中国钱庄史》(黄鉴晖,山西经济出版社,2005年)、《中国典当业史》(黄鉴晖,山西经济出版社,2006年)是其中的代表。

近年来,学校为了提高教育质量、突出办学特色,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商科大学教育教学模式的要求,明确将传承晋商文化、弘扬晋商精神、构建学科体系、培养商科英才作为办学指导思想,并加大了各项投入,在科学研究、课程改革、教材编写、博物馆建设等多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2007年,学校将山西票号与晋商研究中心更名为晋商研究院。为了秉承学术传统,强化办学特色,开创晋商研究工作新局面,学校设立了晋商研究专项基金,责成晋商研究院编辑、出版了这套“晋商研究当代文库。”

本文库不限定册数,不定期出版。今后将陆续推出新的相关研究成果。

热忱期待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孔祥毅

2008年1月10日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学术史回顾	1
第二节 研究方法及所用资料	13
第三节 基本框架	22
第二章 清代晋商发展的生态环境与历史背景	24
第一节 自然地理环境与政治军事环境	24
第二节 清代以前山西的经济发展状况	33
第三节 行政区划与经济小区	41
第三章 清代山西的农业	47
第一节 清代山西的人口数量及土地状况	47
第二节 农业生产	53
第四章 清代山西的产业集聚	67
第一节 农副产品加工业	67
第二节 工矿业	78
第三节 小结	89
第五章 清代山西商业发展概况及资本集聚	93
第一节 山西人的重商习贾观念	93
第二节 晋商的行商范围	98
第三节 晋商经营的主要行业	109
第四节 小结	134
第六章 清代山西商业企业的发展	137
第一节 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	138
第二节 清代山西最大通事行——大盛魁	146
第三节 小结	157
第七章 清代山西的城市集聚	160

清代山西经济集聚论

第一节 晋中区	160
第二节 晋南区	210
第三节 晋东南区	223
第四节 晋北区	229
第五节 黄河沿线	242
第六节 小结	249
第八章 清代山西的农村集市	252
第一节 农村集市的发展	252
第二节 庙会的发展	258
第三节 小结	263
第九章 “集聚现象”在清代山西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266
结语:晋商研究对当代山西经济发展的启示	280
后记	291
参考文献	293
历史文献	293
现代文献	300
英文部分	308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学术史回顾

综观前人研究成果，笔者试图从山西商业、商人及相关问题的整体出发，来关注 20 世纪对山西商业问题研究的主要线索、时代特征、问题意识及重要的学术积累，尽管这一思路不可避免地遗漏不少有关清代山西商业及商人的研究成果甚至重大成就，但在笔者看来，这是在相当有限的篇幅与时间内对 20 世纪山西商业研究进行回顾的最好方式之一。笔者拟在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山西商业、商人及相关问题研究取向略作评述的基础上，再对若干主要研究领域的学术成果试作总结。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般研究清代山西经济史的学者，以研究晋商和山西票号问题为多。

一、山西商人研究

晋商的研究以日本学者较早，其中以寺田隆信为著，其专著《山西商人研究》^① 几乎是第一部以明清晋商为研究对象的著作，本书就晋商产

^① [日] 田隆信：《山西商人研究》日文版出版于 1972 年。中文版由张正明、道丰、孙耀、阎守城等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 年。

生的历史背景和条件进行论述,对晋商的形象、特点和历史性质进行了讨论。此外,日本学者佐伯富^①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和论著,对于晋商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及其社会经济与政治背景,做了系统的研究,并探讨了晋商的营业范围、活动区域以及资本与获利情况等问题。

国内较早对晋商的研究出现在张海鹏和张海瀛所编著的《中国十大商帮》^②中,书中由张正明、黄鉴晖、高春平纂写的“山西商帮”一章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明清时期晋商的形成背景、发展过程、鼎盛时期等内容,并讨论了山西商帮的主要特点及其资本流向等问题。此后,张正明出版其专著《晋商兴衰史》^③,对晋商的兴起、活动、特点、性质和经营方式、成功经验、衰落原因,及其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等问题进行详尽叙述和剖析。黄鉴晖的专著《明清山西商人研究》^④在晋商的经商范围、经营行业、管理制度、商人家族等问题上均有详尽论述,并对明清时期山西境内的商品集散市场进行了讨论。刘建生等撰写的《明清晋商制度变迁研究》^⑤归纳和演绎分析、比较分析及实证与规范分析相结合,首次将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运用于对晋商的制度结构、制度配置、制度变迁和制度成本绩效的分析中,勾勒出晋商发展史的制度脉络,总结了晋商发展的制度演变轨迹,这在晋商研究领域里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方法的突破。经君健先生在学界晋商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的前提下,提出“晋商学”的概念^⑥,使晋商研究领域上升到一个新高度。许檀女士的“山陕会馆”系列

① [日] 佐伯富:《清朝的兴起与山西商人》(《社会文化史学》1966年第1期,1974年10月编入《中国史研究》第2辑)、《清代塞外的山西商人》(《东方学会创立25周年:纪念东方学论集》,1972年11月)、《清代山西商人和内蒙古》(《藤原弘道先生古稀纪念史学佛教学论集》,1973年11月)、《清代山西商人》以及《山西商人的起源和沿革》(日本东方学会主编:《东方学》,1979年7月)。

② 张海鹏、张海瀛:《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年。

③ 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初版,2001年再版。

④ 黄鉴晖:《明清山西商人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

⑤ 刘建生、燕红忠等:《明清晋商制度变迁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⑥ 经君健:《晋商·晋商学“明清晋商制度变迁研究·序”》,《中国经济师研究》2005年第2期。

个案研究^①，详尽、系统地分析了清代山陕商人在河南地区的商业活动，对清代河南商业城镇的发展规模、商品流通状况进行了详细讨论，特别是在研究中大量使用山陕会馆所留存的碑刻资料，开创了研究清代商业的资料新领域。王尚义的专著《晋商商贸活动的历史地理研究》^②，首次将山西的历史自然地理与历史经济地理相结合，对晋商的商贸活动区域进行讨论。

晋商领域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研究的主要方向包括以下几个内容：晋商兴衰问题、晋商与政府的关系、晋商会馆、晋商经营管理、晋商的历史性质、晋商精神及思想理念、晋商行商范围和经营项目、晋商与其他商帮的比较问题，等等，下面我们就做一个回顾。

在晋商兴衰问题的研究上，日本学者寺田隆信^③认为明代“九边重镇”的设立和“开中法”的实施是晋商兴起的先决条件。张正明^④认为明朝为“九大边镇”筹集军饷而推动了“开中制”，从而为晋商兴起提供了契机。同时，山西地处中原的有利地理条件也是晋商兴起的有利因素。黄鉴晖^⑤认为明清时期，山西境内的盐、铁等手工业商品生产的发展是晋商兴起的物质基础。刘建生^⑥认为晋商的兴衰是内部制度变迁的过程。李心纯、林和生^⑦认为，明初山西生态环境未恶化之前，晋商多出于较富庶的南部地区，是靠手中资本乘开中纳粮之机，大兴商屯而崛起的。清代的晋商则在山西北部、中部地区生态环境恶化、农业经济一蹶不振之后，随着关外、口外经济的开发，在不可欠缺的商业发展的需求中走向成功的。梁

① 许檀：《清代河南朱仙镇的商业——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史学月刊》2005年第6期；《清代河南的北舞渡镇——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清史研究》2004年第1期；《清代河南赊旗镇的商业——基于山陕会馆碑刻资料的考察》，《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清代河南的商业重镇周口——明清时期河南商业城镇的个案考察》，《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1期；《清代中叶的洛阳商业——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② 王尚义：《晋商商贸活动的历史地理研究》，科学出版社，2004年。

③ [日] 寺田隆信：《山西商人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④ 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

⑤ 黄鉴晖：《明清山西商人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

⑥ 刘建生等：《明清晋商制度变迁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

⑦ 李心纯、林和生：《山西生态环境的变迁与晋商的兴起》，《晋阳学刊》2006年第4期。

四宝^①认为山西人口的迁徙推动了晋商的兴起。刘建生、王瑞芬^②认为山西商品货币的发展、晋商资本实力的增强和政府的倡导与扶持等原因促成山西典当商人的发展。王明星^③认为明清时期晋商衰败的原因在于没有投资于新式的产业,没有将票号中心南移上海,没有开拓新的活动领域和经营项目以及培养人才的失误等。

在官商关系问题的研究上,刘建生^④认为盐商与政府的关系并不是盐商一方的行为造成的,而是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双方互动合作从而形成的长期合作关系就是政府与盐商的设租——寻租关系。刘建生、燕红忠^⑤利用成本绩效理论对晋商的官商关系进行分析,认为官商结合既为晋商的长期兴盛提供了契机,也是其最终走向衰落的原因之一。韦庆远、吴奇衍^⑥认为皇商范氏的商业经营成就和巨大财力是成为皇商的重要前提,良好的社会关系为其提供了政治庇护,显赫的商业地位则建立了与民商激烈竞争的基础。腐朽的社会生产关系对商人的压榨是范氏衰败的最根本原因,而官商制度则是导致皇商衰亡的根本原因。认为皇商经济是一种依附经济,在封建专制的严密控制下,没有任何独立经营自由。

在晋商会馆的研究上,许檀^⑦利用在河南山陕会馆进行实地调查所得到的碑刻资料,对周口、洛阳、赊旗镇、北舞渡镇和朱仙镇等清代商业城镇进行了系列个案研究,对其发展规模、商品流通及山陕商人的经营状况

① 梁四宝、武芳梅:《明清时期山西人口的迁徙与晋商的兴起》,《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

② 刘建生、王瑞芬:《明清以来山西典当的发展及原因》,《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

③ 王明星:《晋商走向衰败若干原因分析》,《文史研究》1996年第1~2期。

④ 刘建生、刘卓君:《政府与山西盐商的改租——寻租关系》,《学术论丛》2002年第6期。

⑤ 刘建生、燕红忠:《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与晋商的衰落:官商结合的经济学分析》,《山西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⑥ 韦庆远、吴奇衍:《清代著名皇商范氏的兴衰》,《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

⑦ 许檀:《清代河南朱仙镇的商业——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史学月刊》2005年第6期;《清代河南的北舞渡镇——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清史研究》2004年第1期;《清代河南赊旗镇的商业——基于山陕会馆碑刻资料的考察》,《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清代河南的商业重镇周口——明清时期河南商业城镇的个案考察》,《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1期;《清代中叶的洛阳商业——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刘建生^①认为晋商会馆通过联乡情、笃乡谊、聚会议事、沟通信息、方便仕商、办理善举等活动,使晋商的经营规模越来越大,从而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近代商会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李刚、宋伦^②认为明清之际中国传统市场的发展,使整顿市场秩序成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中国封建政府长期实行的“重本抑末”政策,官商不相交接,造成市场管理的空白,使得工商会馆不得不承担起整合市场秩序的任务。工商会馆通过制定行规业律,仲裁商务纠纷,营造“诚信”的会馆文化氛围,以规范商人的市场行为,维护市场的正常秩序。宋伦^③通过对收集到的196所山陕会馆资料分析研究,认为工商会馆是因经济社会发展变化而进行社会整合的制度创新,是富有中国特色的综合性民间社会管理组织和设施。会馆从不同层面反映了明清时代社会的发展变化与历史变迁,是适应明清时期的社会条件而建立的组织;是管理外帮商人的工具,行会的办事机构,商人自发设置的自治团体和社会保障组织。传播本土文化,成为官方管理机构之外平衡社会转型的民间自发管理机构。此外,宋伦^④还认为山陕会馆的建立标志着山陕商帮的形成。

在晋商经营管理问题研究上,张正明^⑤首次将晋商的经营管理制度加以总结概括,提出晋商经营制度主要包括:经理负责制、学徒制、人身顶股制、订立号规和账簿制度等。高春平等^⑥认为股份制是晋商在当时激烈的商业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并使其成为当时中国最大商帮和国际性商人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晋商的股份制未脱离封建经济的范畴,尚未能发展到现代股份资本的程度,而且十分保守。刘建生^⑦认为清代晋帮茶商实

① 刘建生:《山西会馆考略》,《中国地方志》2003年增刊。

② 李刚、宋伦等:《论明清工商会馆在整合市场秩序中的作用——以山陕会馆为例》,《西北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③ 宋伦:《明清工商会馆的产生及其社会整合作用:以山陕会馆为例》,《兰州商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④ 宋伦:《论明清山陕会馆的创立及其特点——以工商会馆为例》,《晋阳学刊》2004年第1期。

⑤ 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

⑥ 高春平等:《明清晋商股份制浅析》,《学术论丛》1998年2期。

⑦ 刘建生:《试析清代晋帮茶商经营方式、利润和绩效》,《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

现了从采购、加工运输、销售一体化的经营方式,使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移,促进了国内茶叶的生产和国际贸易的发展。

在晋商性质及其历史地位问题研究上,刘建生^①指出,晋商的封建性表现在晋商自身的经营活动保留着旧式商人的基本特征,集中表现在与清政府异乎寻常的亲密关系,及与手工业经济的联系上。对于近代工业,不同时期的晋商采取了不同的态度,这种深刻变化反映了晋商由封建商人向近代资本家转变。张正明^②认为晋商经营近代工商业标志着其向近代资产者蜕变,但仍带有封建烙印,客观条件不具备是晋商未能完成这一蜕变的主要障碍。毕苑^③认为晋中地区的商人阶层是最具特色的社会群体,他们结交高官,以多种方式参与社会生活、追求塑造本阶层的社会中坚形象,但是晋中商人不具有独立于主流道德伦理之外的意识系统,而具有双重角色,晋中商人具有浓厚的士首商末意识,经商致富后多数流向仕途。晋中社会向近代迈进,商人阶层呈现出旧阶层淡出,职业化凸显的特色。

在晋商经营行业及行商范围研究上,王尚义^④认为晋商活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明初至清中叶,主要以商贸活动为主;第二阶段从清中叶至民国初年,主要以票号商业活动为主。刘文智^⑤认为清代前期的晋商已经在广阔的地域范围内从事商业贸易活动。林永匡、王熹^⑥认为清代晋商与新疆进行了广泛的丝绸贸易活动。王兴亚^⑦指出,明清时期河南地区交通便利,人口稠密,山陕商人活动活跃,遍布于河南各府州县城及主要集镇,促进了河南商品经济的发展。陶德臣^⑧认为晋商对西北茶市的经营具有多方面意义,它在近代历史上的作用不可低估。曹新宇^⑨对清代山西贩粮路线的演变历史提出反例,他认为区域性市场需求的扩大是刺激粮食长途贩运的重要原因,粮食的运销也支持了相关区域的城市化发展。清代

-
- ① 刘建生:《试论晋商的封建性》,《清史研究》1996年第4期。
- ② 张正明:《晋商向近代资产阶级蜕变的问题》,《晋阳学刊》2002年第5期。
- ③ 毕苑:《晋中商人的角色特征与阶层流动分析》,《清史研究》2002年第2期。
- ④ 王尚义:《晋商商贸活动的历史地理研究》,科学出版社,2004年。
- ⑤ 刘文智:《清代前期的山西商人》,《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
- ⑥ 林永匡、王熹:《清代山西与新疆的丝绸贸易》,《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
- ⑦ 王兴亚:《明清时期河南的山陕商人》,《郑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 ⑧ 陈德臣:《晋商与西北茶叶贸易》,《安徽史学》1997年第3期。
- ⑨ 曹新宇:《清代山西的粮食贩运路线》,《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2期。

晋中南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同内、外蒙古的垦殖活动有一定的互动关系。邵继勇^①认为清代晋商的壮大是与清王朝统一中国版图、平息西北叛乱同步进行的,清政府的鼎力支持是晋商地位显赫的重要原因。同时他指出,票号经营是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结合的结果,将传统的中国商业资本运动推向了最高峰。高春平^②指出晋商由明初崛起于北部边镇,为北部商业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南北物资交流、农村自由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边疆地区的巩固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定光平^③认为晋商于羊楼洞一带采办茶叶,促进了当地茶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对羊楼洞茶区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羊楼洞制茶手工业的兴起,又对当地及其周边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晋商资本由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嬗变,其茶庄的经营形态也逐步由小作坊发展到规模宏大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并出现了向近代机器制茶工厂过渡的趋势。

在晋商精神问题研究上,葛贤慧^④指出,晋商扎根于山西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中,晋商依靠黄土文化赋予的吃苦耐劳、坚韧不拔、诚信笃实、刚健有为的精神,走出了一条创业进取之路。王继军^⑤认为晋商在兴起和发展中形成的诚实信用等法律文化特点是建立在“人身法”文化和农业文化基础上的,与建立在“市民法”文化基础上的近现代意义的诚信原则相比较有着根本差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治建设中,晋商诚实信用的法律文化精神仍然需要发扬光大。杨艳红^⑥强调文化与伦理在社会制序的结构与变迁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几千年“重义轻利”的儒家文化,孕育出“利以义制”的商业习俗与经营制度,也即儒商制序。在这种制序中,关于诚信的集体惩戒机制起着尤为重

① 邵继勇:《明清时代边地贸易与对外贸易中的晋商》,《南开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3期。

② 高春平等:《晋商与北部市场开发》,《晋阳学刊》2002年第4期。

③ 定光平等:《清以降羊楼洞茶区的山西商人》,《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④ 葛贤慧:《商路漫漫五百年——晋商与传统文化》,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⑤ 王继军等:《晋商诚实信用法律文化特点研究》,《理论探索》2002年第4期。

⑥ 杨艳红:《文化、伦理与社会制序:以山西票号为例》,《世界经济文汇》2002年第1期。

要的作用。张奎胜^①和王劲松^②均指出诚实信用原则是市场经济中普遍适用的原则，也是晋商在激烈竞争中得以制胜的法宝之一。

在晋商与其他商帮、商人的比较研究上，张正明^③将晋商与犹太商人、威尼斯商人及荷兰商人进行了比较，认为前者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业精神，有无比优越的计算智能，有发达的数量意识和金融才华。刘建生、燕红忠^④认为晋商与徽商作为明清时期两大地方商人集团，由于他们所处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演进轨迹的差异，使其管理阶层的划分、商业运营中的激励约束机制等呈现出不同特点。晋商与徽商不同管理模式的选择及其特定的约束激励机制也为现代企业管理和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些可资利用的资源。李一鑫^⑤认为明清晋商、徽商的兴起具有深厚的文化思想根源。梁四宝、燕红忠^⑥认为，晋商与江右商帮均是明清时期较有影响的地方商人群体，但相对于晋商较强的群体意识、雄厚的商业资本和商业竞争观念而言，江右商帮则表现出了资本分散、竞争力弱及角色意识较差的特点，从而使其逐渐衰落。

此外，在晋商家族、算学等方面的研究上，许多学者对晋商家族与个人的历史问题作了研究。如张正明的《从族谱看山西商人家族》^⑦、《山西商人范毓馥家族的谱系和事迹》^⑧，松浦章的《山西商人毓馥一族的系谱和事迹》^⑨，李华的《清代山西平阳大商人亢百万》^⑩等。另外，刘秋根^⑪

① 张奎胜：《诚信经营看晋商》，《当代经理人》2002年第11期。

② 王劲松：《山西票号与社会信用》，《山西档案》2002年第5期。

③ 张正明：《明清晋商与犹太商人比较研究》，《晋阳学刊》1994年第1期。

④ 刘建生、燕红忠：《论传统文化在商业运营中的作用——以晋商与徽商经营管理比较为例》，《中国软科学》2003年第1期。

⑤ 李一鑫：《从晋商徽商看国史脉络》，《炎黄春秋》1998年第1期。

⑥ 梁四宝、燕红忠：《江右商帮与晋商的差异及其主要特征》，《生产力研究》2002年第4期。

⑦ 张正明：《从族谱看山西商人家族》，《谱牒学研究》第3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

⑧ 张正明：《山西商人范毓馥家族的谱系和事迹》，《谱牒学研究》第2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

⑨ [日]松浦章：《山西商人毓馥一族的系谱和事迹》，[日]《史泉》第52期。

⑩ 李华：《清代山西平阳大商人亢百万》，《清史研究通讯》1984年第4期。

⑪ 刘秋根：《明清算术书中的合伙经商各例题情况表》，载《明清高利贷资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